

壹、前言

澳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特別是貿易取向的部分，已因其龐大的經濟利益而深受澳洲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關注，此外，還廣受他國政府（特別是打算進行教育輸出的國家）、國際教育行銷與諮詢機構，以及高等教育學者與實務者的研究興趣，這些關注與興趣也替澳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累積了不少研究文獻與報告（Harman, 2005）；因此，要從文獻中，綜合、整理、歸納澳洲教育輸出的作法、策略、評估、挑戰等，並不是太困難的事。例如，澳洲學者Harman（2005）就曾針對1990~2003年間，有關澳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96篇文獻進行分析，並指出多數文獻關注焦點均放在澳洲的教育輸出與大幅增加的國際學生，且涵蓋了所有與教育輸出有關的議題，包括政府鼓吹貿易自由化及相關法規的修正與建置，以及高等教育機構如何在管理經營、招募行銷、學生服務、風險管理、課程及品質保證機制上進行調整與因應等。

相同地，國內對於澳洲的高等教育及其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也相當關注；前者如王如哲（1998）對於澳洲高等教育經費補助機制的研究，戴曉霞（1999）對於澳洲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比較，以及江愛華（2006）對於澳洲高等教育政策框架進行解析。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部分，有楊靜子（2005）對品質保證機制建構的介紹與比較，蘇建洲（2006）分析澳洲擴展高等教育國際市場之優勢條件與作法，Laws與江愛華（2006）也對澳洲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提供不少背景的描繪，姜麗娟（2008）則從澳洲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積極作為的分析，發現澳洲貿易取向的國際化發展已使長期處於邊緣、外掛、活動取向的國際化成為高等教育機構管理的核心議題，以期在學術負面影響觀點之外，提供較平衡的面向來了解貿易取向國際化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儘管澳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相關文獻已如此充沛，但本文基於以下

觀點，並以實證研究（訪談與文件分析）為基礎，提出重新檢視澳洲貿易取向國際化發展的必要性，一來藉由澳洲個案增加高等教育機構變革的參考實例，另一方面藉此強調，教育輸出的作法或策略的仿效，是不可忽略其形成之背景脈絡下的條件，以超越單純以正、負面的影響了解貿易取向國際化的發展：

一、從高等教育機構的變革觀點重新檢視澳洲個案：澳洲因高等教育公共經費減縮、全額學費外國生名額的鬆綁、澳洲大學對外擴展高等教育市場的迫切性，使得大學必須更正面地看待外來的挑戰，以及從事內部組織的變革。因此，由政府啟動的政策（澳洲貿易取向）如何成為高等教育機構變革的契機？此契機所導致的結果，是政府當時設想目標或根本是政策未預期的結果？或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在因應政府經費緊縮下的選擇與行動，更甚於政府政策的設定？

二、澳洲是一個結合高等教育國際化與高等教育機構變革的重要個案：學者Van der Wende（1999）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高等教育機構的一種創新變革，但卻鮮少見到高等教育機構以整體改革推動其國際化的實例。而澳洲貿易取向的國際化發展，正屬於此類被Van der Wende認為最有野心但因風險較大而較少出現的實例。

三、澳洲的貿易取向國際化發展結果，是否可以算是Knight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歷程說」（process）的現身說法？儘管澳洲貿易取向國際化是否應被認為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面向之一仍有爭議（Harman, 2005），但貿易取向的發展、國際學生人數的大幅增加，顯然地加速高等教育國際化「融入」至高等教育整體面向（包括治理願景、管理策略、課程、教學、學生服務、資源分配及品質保證等），並使澳洲原本發展緩慢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得以快速推動（Adams, 2007）。因此，本文認為值得重新檢視澳洲個案，以回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程說。

四、從澳洲學者與政府部門人員如何以自己國家的教育輸出經驗，對欲進行教育輸出的台灣提供建議或可思考的方向。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文主要目的：以實證研究（訪談與文件